

問題一：

提兩個比較在意的問題。第一，今天談的金融制度的健全化、效率化時，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可是在國內，政治的環境裡尚有很多本土化的意識型態，在經濟發展轉型中，金融扮演了相當幅度的保護角色，請各位深入探討並有所回應。

第二有關葉銀華教授提到的三點：public governance、financial governance、corporate governance。Public governance正是整個政治環境的問題，financial governance而是今天金融治理的問題，我想聽聽邱部長對於台灣金融發展跟隨美國軌跡的經驗與回應。

又我們談了兩天一致認為金融改革的漏洞很多。從蔡英文副院長談到要強化金融監理

體制，公股應該扮演制衡的角色，強化公司治理，擴大市場規模，今天的政府即要強化體制，是否有agenda、有何方法可以快一點。現在Leverage buyout大量充斥在台灣的金融體系中，我們面對的金融掏空的危機相當地大，另有國土規劃等土地問題需要探究。請諸位提供催促及針砭。

問題一：

請教三位前財政部長及二位專家，就台灣的新世紀金融自由化，是否要從一個市場的角度讓政府不要來干預市場的金融自由化的方向。因為台灣的金融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喊口號，說要金融自由化卻未建立監理的透明制度。這一點，從你們以前當過政策執行者，有何看法？因為金融自由的流動沒有被有效的建立，整個金融消費的活力未被重視，所以整個台灣的金融商品和國際現實是有脫節的，讓整個台灣產業升級的動力醞釀不出來。政府是否可以思考從金融重建基金撥出一部分的錢來對於消費權利動力的提升，讓整個金融環境的自由化得以在這樣一個個體的結盟之下，可以被有效地建立。這一點，兩位專家不知

有何看法？如果說台灣不從消費基礎面來看整個金融改革，那這樣的一個基礎要和國際結盟就還有很大的落差，即在台灣自己喊自由化，但金融商品卻是在國際上是無競爭力的。

問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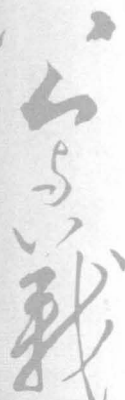
我想請教薛琦院長兩個問題。一是有關金融機制何去何從。從貨幣本身當成一種商品進行經營營利的經濟活動是源遠流長的，從戰國時代高利貸即已非常普遍。齊國的孟嘗君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放高利貸者；從唐代的飛錢，宋代的便換，乃至於清代錢莊，通過簽發票據進行異地的發匯，中國可以說是國際金流的先驅者。可是在五十多年前，中國發生了金圓券的風暴，乃至於台灣現在金融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來有發生過的。請教政府的揭露信用的問題，可以從宋朝以來，從講求信用做為經營的傳統。以中國古老的商業習慣，憑據客戶的信用，一般是不用抵押的，我們現在是不是倒退了？第二個問題是，為何中國金融在近代無法落實？我引用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秦斗李約瑟一句話：「近代科學不能夠發生在中國是由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結構和環境與歐洲不同，不是由於中國人有任何不適宜

科學的傾向。」那就是說，為何中國的金融企業不能在中國落實？從清朝的山西商人引導票券的發展，台灣企業界在國際金融的活絡有何有利的條件？

問題四：

我對於民營化還是有些疑慮存在。不管在經濟學或財政學上來講，效率和公平一直是兩難的議題。這兩天的會議似乎對公平的著墨較少，大家都主張要自由化。所以我們看政府進行民營化，等於是把對國家影響甚大的金融產業要讓私人來經營的話，我們還是會有一些疑慮存在。大家都說民營化好，但是民營化後的一些問題就丟給事後的一些法規、監理機關來處理。現在我們就是對於那些法規、法律和監理機關的一些做法和行政不彰多有疑慮，所以我們想知道這樣的民營化是否會讓我們感到很安心。另外，公營行庫民營化後，對於國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工具會不會因此而削弱？由於一些公營行庫也很賺錢，對於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否會有影響？謝謝。

邱正雄答：



關於山西票券的提問，現在信用比以前差。我記得以前的錢莊、票號都是一句話，說了就算，好處是對於貸款人很了解，壞處是外在環境變化時，所了解的人的信用狀況也會發生變化，也就無能為力了。所以後來錢莊就倒了，無法生存。錢莊這種老中國傳統是，出錢的人每一份貸款的權利，這種就不太會徵信，認得的人就放，就像我們到東南亞時，華僑就是這樣。現在的時代已經演變為，看公司放款是看它的現金流量，然後看擔保品等等，現在的社會是用比較客觀的標準，比以前進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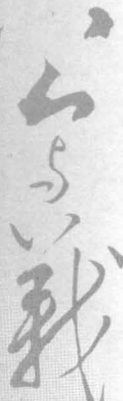
第二，關於公平的問題。事實上在談弊病時就有談到公平了。財政學上的確是有效率就沒有公平，但是會得到平衡點，在美國，其制度是很嚴的。恩隆案的兩個關鍵人物被判刑三百多年，罰得很重。相對上，在美國設一個公平競爭的規則，大家就在規則上一起玩，不能有特殊的情況。美國的法和台灣的法不同，平常不太罰，但會從你發生事情的那一天到現在為止，不管十年、二十年，不當得利就是加倍要罰。台灣是從現在看到開始罰，以前的事情就逃過去了，這是會讓人覺得不公平的地方。然而台灣的國情和美國不

同，在台灣，改正的責任是在主管機關，而在美國，改正的責任是在違規者。兩者相比較，大家會覺得美國比較公平。

薛琦答：

金融的確在整個經濟中的角色很特別。一九九七年有一位金融專家寫了一篇關於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的文章。其實把那篇文章看了一看，簡單的說法是，一個國家的金融的廣度有多麼地 *breve*，其深度有一些指標來衡量。他大概收集了七十幾國家的資料，以一九七〇年為起始點，把七十幾國家的金融市場的深度與廣度的指標編製後，可以很正確地來推估國家未來三十年的發展。若去看歷史的話，大家好像覺得工業革命是瓦特發明蒸氣機，但是那時有人說，如果英國那時沒有金融市場上的變革（銀行出現），有了銀行的作用是可以聚焦資金，資金集中後就可針對企業進行放款，企業才可能大型化。所以工業革命的大型企業的出現，背後事實上是金融制度的變革。

IT產業，台灣表現非常好。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IT產業在資本市場上所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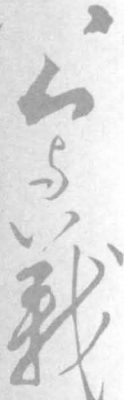
比重，一九九〇年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到了現在為止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美國的數字大概剛好三分之一。全世界最高的國家是芬蘭，約百分之七十幾，而芬蘭就只有諾基亞一家IT產業，把諾基亞拿掉，數字就不見了，所以告訴我們的是，如果沒有一個非常活潑的金融證券資本市場的話，IT產業是發展不起來的。

最後針對金融和本土化問題。如果真正理解全球化的意思，一個是資金的移動，另一個是制度的競合。隨著制度能夠survive，最合理的就是贏家。美國的金融制度還是相當地不錯，金融行業又是一個很特別的產業，政府非管不可，因為它是在管別人的錢。但是金融行業又不能過度管制，完全不管制也不行，所以蔡副院長講到動態管理，實際上我還是相信rule base的管理。行政裁量表示環境變動要有不同的做法，但是還是要把它put into rule or rule by rule，用一個很清楚的法規來管理。最後，亞當史密斯說過，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到最後，如果有一個因素在限制國家成長時，那個因素就是國家的法律與制度。我覺得今天，台灣當前的經濟問題，反映到背後也大概是金融問題，金融的問題表示制度我們也

還在學，但總是要經過一個嘗錯與錯誤的過程。繼續會不開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倒是把今天的金融的主管機關，真正找幾個專家關了門好好看一看，提一個白皮書。因為現在政府的信用不是那麼好，所以要做 credit enhancement，真的要開誠布公，把專家找來，不能找太多企業家。把這些問題好好談一下，或許是一個解決的辦法。

林全答：

有人問到，民間股東會紀念品可否立法禁止？當然可以。只要立法院立法即可，但我想有股東會紀念品的原因，是因為有很多公司股權太分散，以至於不發紀念品是開不成股東會的，這個問題要先來解決。第二，民間自助會是否可以立法確保其法律效力？我想民間跟會目前有民法保障，要再立法，除非有主管機關要管理，但我想可能性不大。回到我的主題，我在財政部三年忍辱負重，其實是希望國家的租稅制度能夠有所改善。而我剛到財政部，正好是證券市場整個景氣是非常差的時候，要先把經濟弄好，否則稅制改革推不動。在過程中，我也面對金融改革的困難。





讓台灣的金融產業進步，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經濟學告訴我們，要促進競爭，就讓競爭更激烈。促成競爭之後，自然會有競爭壓力，就會整併，這其實並不困難，但問題在整併的過程中，銀行可能會倒掉，但是銀行是不能說倒就倒的，因為涉及到存款人的權益，社會大眾的利益。所以一方面我們認為銀行要開放競爭，一方面又得高度管理，所以這兩類其實並無矛盾。高度管理要讓它管理到能夠不在金融重建基金下退場，若能做到這一步，管理問題就全部解決了，以前是退場很困難，現在是重建基金可以退場，下一步就是挑戰沒有重建基金的退場。若能把這一步做好，其實後面的管理、配套就差不多了。可是台灣的金融市場更複雜，台灣還有一半是公營行庫，美國的方式都是對付民營銀行的辦法。公營行庫如果這樣搞，競爭到最後的結果，公營銀行有很多是不行的，它也不會倒，就賴在政府身上就好了，所以要同時解決兩個問題，所以才會有公營行庫需要整併與二次金改的議題跑出來。

現在二次金改被批評，論述不清是一個很大的弱點。可是我覺得在實行的過程中也確

實有很多的困難，也值得大家思考。但靠組織改造，每家公營行庫是否就能成功，如果是這樣，台灣有很多公營銀行是不可能走向國際的。所以要民營化，釋放到民間經營或引進民間的競爭是必然的結果，可是要如何做？很多人說讓外資來，但是，首先我要問：外資要去哪一家銀行？彰化銀行的標售，為何外資興趣缺缺？因為彰銀有一千多億的不良資產，看都看不清楚，外資要的銀行是透明度夠高的。私募基金或許願意進來，但是他們的處理方式未必是社會大眾能夠接受的。

第二，即使透明度夠，外資不會願意持有太少的股權來經營，因為它是拿商譽在做保證。除非講好將來可以拿到多少的股權，是否可買到一家最好的銀行，外資最有興趣的就是一銀，因為一銀的資產很透明，但如果一銀馬上被外資拿走，社會大眾的觀感會認為政府又在濫用國家公器，如此一來，後續的動作是做不下去的，所以我才說，我們面對問題時，必須一步步從小的地方開始做，先做幾個案子出來，對政府的做法有信心了才有以後的大案子。為何今天政策會走到這個地步，就是因為大家缺乏共識，沒有一個共同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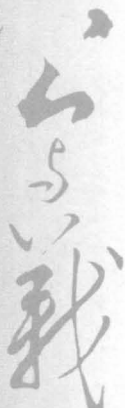
時，下面的事情是做不通的。最低稅負制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它就是一個論述，把它講得很清楚，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有無租稅減免，總之多少繳一點。我今天還是聽到很多不一致的意見，這些不一致的意見如果繼續存在下去，五年後我們勢必得再面對同樣的問題。當然，我覺得公與義是存在的，銀行需要管理就是需要解決公與義的問題，但是市場的競爭和公與義是要並存的，如果只是談公與義不談競爭的話，這種公與義也是沒有意義的。

朱雲鵬答：

現在人很多人擔心的是，國際化以後，台灣主體性會不會消失的問題——即台灣意識。我和華教授昨天談過這個問題，談話的內容是，第一，我們先要考慮到的是文化的主體性。亦即，台灣人或者是we group的觀念會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消失還是強化？我們的感覺是，假定有一個人到大陸、美國、愛爾蘭去做生意，有些主體性看起來會略微消失，會略微融入當地社會。但是在我們了解的大多數情況，台灣的意識是被強化的，即生活在台灣

這麼久的時間，台灣意識遠遠不如以前我在美國留學時一起遇到的留學生，那個 we group 非常強。台商也是一樣，和大陸的商人、香港的商人做事的基本態度都不同，台商比較可靠。我們的感覺是，國際化在文化的自我主觀的認定上，不但不一定會消弭本土意識，或許還會強化台灣意識。

第二，台灣在經濟上會否因為過度依賴大陸或國際市場而導致國防安全受到影響？我們的感覺是，台灣沒有經濟就沒有安全了。台灣之所以有今天，談國際地位等話題，如果當初台灣的經濟不是高速發展，什麼都不用談了。所以經濟其實是台灣安全最重要的支柱。如果我們判斷國際化對台灣的經濟是有幫助，使得台灣的經濟更強大的話，我們也應該贊成。第三，萬一國際化以後，企業全部跑了怎麼辦？我們要問：美國矽谷不可能製造，除了英特爾還在做一些晶片以外，矽谷已無人在生產晶片，矽谷人在做設計、研發。但是，為什麼那些企業還是留在那裡？說穿了就是著眼於國家核心競爭力——經營環境和生話環境。就像台灣，很多企業出去了，但是研發、利潤中心、營運中心還是有些會想盡辦



法留在台灣。就像日本企業，一大堆外移了，還是把核心技術、總公司的管理、營運總部留在日本。所以一個國家最終競爭力的根源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經營環境和生活環境。而這些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事情。我們認為，台灣要真正具有競爭力的話，第一，要有真正很好的民主制度，要有獨立的司法、地方的分權。民主的社會、開放的社會、良好的生活環境就是核心競爭力！所以我覺得國際化和台灣的主體性是沒有衝突的。

第二，林部長提到社會上很難有共識，引進外資也會有一些顧慮，在此我想引述華而誠教授所說的，中國大陸的四大行庫在引進外資之前，都是壞帳累累，因為很多都是政府的隱形負債，所以不能在那樣的狀況下引進外資，外資也不敢進去，所以，他們在引進外資之前，把原來所有政策包袱留下來的資產清理掉，把公司重整，等到一個可以進入下一阶段時才招外資，此時外資就搶著來。我覺得台灣現在就是希望把公股釋出，找一個主體來經營，而主體最好是聲譽佳、經營能力很強，可以引進新的管理制度。第二，我們希望外資儘量留用在公營行庫內的優秀人才，因為外資比較沒有本土的精英團隊，公營行庫

的優秀經理人或許可以和外資一起組成一個新的經營團隊。經營好的話或許還可以再去買國內的金融機構。

心與我